

袁荻涌 著

二十世纪初期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十世紀新聞

中外文學與藝術研究

袁荻涌 著

二十世紀初期
中外文學關係研究

中國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初期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袁荻涌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中华学人丛书 徐传武主编)

ISBN 7-5034-1234-8

I. 二… II. 袁… III. 近现代 - 文学 - 研究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616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韩淑芳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 / 32

印 张: 11.875 字数: 33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插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234-8/K·0853

定 价: 3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印刷厂负责退换。

目 录

导言：西洋文学的输入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1)
第一章 外国文学翻译的基本轮廓·····	(15)
一、近代翻译文学概说·····	(15)
二、译述·意译·直译——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形态演变 ·····	(21)
三、域外长篇小说输入中国的第一次浪潮·····	(33)
四、我国早期译介西方短篇小说述略·····	(42)
五、清末文学杂志与翻译小说·····	(51)
六、清末民初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56)
七、“五四”时期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文化成因 ·····	(67)
第二章 外国文学翻译的主要类型·····	(78)
一、清末政治小说的译介·····	(78)
二、西方言情小说在近代中国·····	(86)
三、域外科学小说的输入及其影响·····	(95)
四、西方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105)
五、伊索寓言在清末中国的译介·····	(116)
第三章 林纾：杰出的文学翻译家·····	(123)
一、林纾和他的翻译·····	(123)
二、再谈林纾及其翻译·····	(129)
三、林纾文学翻译思想刍议·····	(134)
四、林纾与欧美名家名著·····	(143)

五、林纾与哈葛德小说·····	(151)
六、论林译小说的历史地位·····	(160)
七、林纾的中西文学比较谈片·····	(168)
八、林纾小说创作与西方文学·····	(178)
第四章 晚清文学变革与外国文学 ·····	(185)
一、域外政治小说对晚清文学之影响·····	(185)
二、外国文学对近代小说理论的影响·····	(194)
三、清末民初小说形式的演变与外来影响·····	(202)
四、近代新体短篇小说与外国文学·····	(211)
五、鸳鸯蝴蝶派小说与西方文学·····	(221)
六、近代中日政治小说的比较研究·····	(230)
七、近现代中日文学的交流互润·····	(239)
第五章 近代作家与外国文学 ·····	(249)
一、梁启超与外国文学·····	(249)
二、吴趼人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258)
三、吴趼人小说艺术的创新与外来影响·····	(267)
四、刘鹗与外国文学·····	(275)
五、曾朴对法国文学的接受与翻译·····	(285)
六、苏曼殊与外国文学·····	(296)
第六章 中西文学比较的最初尝试 ·····	(307)
一、晚清：中国比较文学的滥觞期·····	(307)
二、清末文坛论外国文学·····	(314)
三、清末学人比较中西小说纵横谈·····	(325)
四、民初文坛论外国文学·····	(335)
五、民初文坛的中西文学比较·····	(343)
六、孙毓修和他的《欧美小说丛谈》·····	(353)
后 记 ·····	(358)

导言：西洋文学的输入与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回顾近代八十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发现，西洋文学的译介贯穿了整个过程。然而在前六十年的时间里，翻译文学的成绩却微乎其微，可以说，西方文学的大规模输入，是在最后二十年的时间内实现的。近代翻译文学的长期冷寂和突然勃兴，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潮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只有深入观照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衍变，剖析社会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者——近代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的复杂心态，才能把握西洋文学东渐的历史进程。

—

西方文学输入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利玛窦等人翻译的《况义》（《伊索寓言》）一书，甚至可以上溯到元代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但是，《况义》所收的 20 多则寓言，只是利玛窦传教活动的一个小小副产品，除对个别文人（如福建的李世熊）略有一点影响之外，在中国读书界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至于马可·波罗，则可能将《圣经》中的某些故事带入中国，以致在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中留下了少许痕迹。除此之外，我们似乎已很难再找出近代以前西方文学输入中国并产生一定影响的实例了。由此看来，中国尽管在历史上与西方有过多文化上的交往，但具体到文学一项，则几乎还是一个零。

近代史的帷幕一拉开，西方文学就来到了中国。1840 年，

《广东报》上刊载了由英国人翻译的《伊索寓言》82则。50至70年代陆续创办的一些杂志，如《六合丛谈》、《中外杂志》、《中西见闻录》、《小孩月报》、《教会新报》（后改名《万国公报》）等，也经常发表西方寓言、童话。其中《伊索寓言》最多，拉封丹、莱辛、克雷洛夫等人的作品也时有所见。为什么最初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文学多为寓言、童话呢？这是因为上述刊物几乎都为外资经营，洋人办刊大多出于传教目的，附带也介绍一些西方文化知识。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所知甚少，寓言、童话等短小精悍且浅显易懂的作品易于为其接受。尽管上述刊物几乎每期都要编发一些外国寓言、童话，然而西方文学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一则因为刊物发行范围较小，二则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都有意无意地持一种蔑视态度。特别是这后一点，是导致西方文学在我国的译介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已被西方凭借武力和经济优势所打开，西方文化也随之涌入中国。天朝帝国的传统文化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还勉强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洋务运动提倡学习西方，也只是慑于西方人的船坚炮利，而仅着眼于功利性强的实用技术之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实际上既不包蕴政治体制，更不涵盖学术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本身，就已经充分表现出近代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基本格局的认同和笃信。传统的因袭重负，加之西方文明的强力闯入所造成的心理反感，使中国知识界很难在异质文化的挑战面前作出积极的回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把西方视为“蛮夷”之邦，对其学术文化嗤之以鼻，甚至把洋人说话讥之为鸟叫一般。直到上世纪末，在翁同龢的日记中，还能找到此类令人好笑的例子。

中国士大夫是那样轻视西方学术文化，以致他们从不曾想到有译介和研究外国文学的必要。洋务运动兴起后，从中央到地方

虽然设立了不少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但都不曾译介过西洋文学。英国传教士傅兰雅 的《译书事略》，收录了 1878 年以前 20 年间我国翻译的西学书目，总计达 140 多种，文学书籍竟告阙如。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我国连一本外国文学作品都没有翻译，但数量之少，不为世人注意，这倒是事实。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一个时期，在 1896 年的《西学书目表》和 1899 年的《东西学书录》等文献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我国翻译的西学书籍可谓种类繁多，但同样未收文学书目。国内的翻译界如此冷落西方文学，那么派到国外去的人又怎样呢？他们是否能成为早期中西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我国曾陆续派出一些人到西方学习考察，并派公使出使欧美各国。到西方学习考察的人出于实用目的，根本无暇去注意文学艺术。而派驻各国的公使和随员，其中很多是文学之士，在国外呆的时间也比较长，但他们同样表现出对西方文学毫无兴趣。当然，语言的障碍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时的外交官们，几乎都不谙外语，这就妨碍他们去接触和领会西洋文学。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此。文学的传递交流有多种途径，然而种种渠道都被“道德文章冠全球”的民族自大心理堵塞了。因此，象斌椿、郭嵩焘、张荫桓、薛福成、曾纪泽、黎庶昌等人，尽管都精通诗文，文学素养深厚，出使期间常操文学之业，赋诗作文自娱，可是他们又都表现出对所出使国家文学的极端冷淡。黄遵宪使日期间虽与日本诗人有过一些交往，但常以指导者身份出现，归国后更是绝少谈论日本文学。这些外交官的兴趣不能说不广泛，他们在处理公务之余，曾饶有兴趣地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政体、工业、军制、外交、教育等，兴奋和惊讶地观赏着西洋的名胜古迹，戏剧美术、杂耍工艺，乃至动物园里的珍禽异兽。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们内心也钦佩得很，虽然免不了死要面子，硬说这些玩艺儿中国“古已有之”。可以说，西方

的许多东西都引起这批文人出身的清朝外交官的兴致，可偏偏对文学他们却视而不见。不错，他们观赏过戏剧，但并不当做一种文学欣赏，而把这同看马戏、看魔术表演视为一回事。即使在他们的日记中，偶尔提及某个剧本的情节，也不说明剧目名称和作者。曾出使英伦的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张德彝等人，都从来不见他们提到过莎士比亚等英国文豪。李凤苞在《使德日记》中有一处提到歌德，也是因为他去为美国公使送殡，而此公恰巧是《浮士德》的英译者。如果不是这一偶然的原因，那么，清末中国外交官著作中提到出使国大诗人的唯一事例，亦将不复存在了。^①

上述这些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的中国知识界精英对西方文学尚且如此冷漠，至于国内那些以背诵孔孟大谈诸子百家为能事的士大夫们对西洋文学持何态度，那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前期译介西方文学的人，便几乎都是外国人。他们翻译的作品种类不多，层次不高，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可言。国人偶尔有译作面世，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 1873 年，我国最早的文学刊物《瀛寰琐记》用长达两年的时间，连载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而读书界则反应寥寥。戊戌维新以前的中国翻译文学界，大致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二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海军吨位和军舰数量均超过日本的北洋水师，竟然打不赢东洋一个小小岛国。举国震惊之余，中国人总算幡然猛醒：“西人之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②，只引进西方的声光化电并不足以抵御外侮，要救国必须首先改革国家。于是，思想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的社会科学，强调“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译之”^③。至此近代中国人向西方的学习进入第二层

面，即以西方政体为参照系，谋求解决本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问题。个别思想深邃、目光敏锐的人，如严复等，甚至注意到在社会科学背后，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西方哲学。严复认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除了制度的改革之外，更重要的是进行思想改革。如果不彻底改变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任何外部的改革都将是徒劳无益的。为此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等多种西方哲学名著，把进化论的思想输入中国。

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热心译介和研讨，带动了人们对西洋文学的关注。1899年，林琴南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很快“风行大江南北”^④。这是第一部在中国赢得极大声誉的外国小说。从此，西洋文学开始大批介绍到我国，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引进外国文学的高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壬寅（1902）、癸卯（1903）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这个时期，西方文学的翻译在数量上已超过理化、博物、矿务、商务、农政、宗教、工艺等类；莎士比亚、雨果、普希金、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契诃夫、司各特等著名作家及其作品已输入我国；《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外国小说在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对外国文学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全面的认识，加之急于利用外国小说为现实政治服务，所以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优秀的并不多。当时充斥译界的主要是这几类作品：政治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和科学小说，尤以政治小说最为盛行。

清末译介西方政治小说是在非常明确的理论倡导下开始进行的。1897年，严复、夏曾佑为天津国闻报馆撰写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发表，这是近代第一篇阐明小说社会作用，提高小说地位的理论文章。文中特别指出：“欧、美、东瀛，其开化

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文章虽然没有提出“政治小说”的概念，但已把小说的作用和社会的进步联系起来，其精神内涵和政治小说是一致的。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发表，为译介政治小说提供了理论依据。次年，梁启超的著名文章《译印政治小说序》在《清议报》第一册刊出。文章强调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其他一些人也纷纷撰文阐述译介外国政治小说的重要性。如《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词》曰：“有释奴小说之作，而美洲大陆创开一新天地。有革命小说之作，而欧洲政治特辟一新纪元”；《新小说》的“小说丛话”专栏则曰：“吾中国若有政治小说，插以高尚之思想，则以之转移风俗、改良社会亦不难矣”；等等。由此看来，戊戌维新前后，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西方各国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军事强大以及国力昌盛均得力于小说，尤其是得力于政治小说之助。于是他们主张着重译介西方政治小说，使之成为“改良群治”的武器。维新派人士亦身体力行，积极从事译介活动，比如梁启超就翻译了日本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不仅如此，他们还自己创作政治小说，利用小说形式表现其政治理想，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蔡元培的《新年梦》等等。

由于维新派的大力提倡，翻译政治小说便成为当时译界的一种风尚。强烈的忧患意识使翻译家们无暇顾及小说的审美属性，而只注意域外作品的政治功能，特别发掘其“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之外。1903年，林纾、魏易合译之《黑奴吁天录》出版，林纾作其《跋》曰：“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

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陈冷血在其译作《虚无党》一书的《叙》中，谈及翻译该书之原因：“我爱其人勇猛，爱其事曲折，爱其道为制服有权势者之不二法门。”译家们都唯恐读者忽略这些小说的政治色彩，故不遗余力地在前言后记中阐发小说的政治内涵，并且往往加以夸大。其实用理性之精神，可谓强矣。

近代知识分子注重译介政治小说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的。中国文化从先秦以降便始终贯穿着一种“实用理性”精神。执着人生，讲究经世致用，漠视与现实人生无关或相距较远的各种自然知识和抽象理论，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求知态势和治学准则。任何学问，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如果不落实到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层面上，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清末，西方列强纷纷叩门而入，民族自救成为中国人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根本无法叫人安心做学问的年代，知识分子耳畔回响的始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而他们赖以报效苦难深重的祖国的，也唯有学问一项。因此，他们便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所有的精神活动，都纳入到救亡图存的政治轨道上来。可以说，每当历史上国家、民族的命运到了生死关头，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便表现得尤为强烈。

译介政治小说之风的直接诱因，则来自东瀛。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全面否定旧传统，种种改良应运而生，其根本目的都在于促进政治改革的成功。当时日本广泛译介欧美文学，并把翻译文学有意无意地政治化，许多作品都被冠以“政治小说”之名，即使是在莎士比亚的剧本和司各特的小说中，日本翻译家也读出了其中的政治意味。这种翻译文学的政治化倾向，不能不给甲午战争之后开始关注中国的知识界以启迪。箸夫在《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中说道：“日本维新之初，程效之捷，亦编译小说之力居多。”这样的认识，在中国知识界颇具代表性。

由于中日两国过去在政体、文化传统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近代又都受到西方文明的侵扰，这就使得两国在面对异质文化时具有了共同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都希望从西方文化中找到变法图强的利器。不同的是，日本很快由被动接受转进到主动吸收，而中国则始终是在极不情愿的屈辱状态中向西方学习。因此两国虽然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同时起步（中国甚至略早于日本），但彼此的差距却越拉越大。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在东亚的迅速崛起，无异于在徘徊不前的大清帝国面前树立了一个值得效法的样板。一时间，上万学子负笈东渡，向西方学习具体化为向日本学习。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政治化也就自然产生了。

维新派利用翻译小说引进西方新学，开启民智，加快向西方学习的步伐，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收到了成效。所以，“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中国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废科举、办学校、练新军便是明证。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改良主义者夸大了西方文学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过分偏重翻译小说的政治功利性，缺乏对外国文学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忽视对文学本身规律和特点的研究，因此翻译作品虽汹涌而至，却并未引起国内文学观念的根本变化，未能动摇封建文学的统治地位。同时，为了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改良主义者对不符合其政治主张的译作，也大加贬斥，如对《巴黎茶花女遗事》等写情小说便严加指责。这种单一的审美欲求和价值取向不仅阻碍了翻译文学的多样化，而且暴露出改良主义者在文化战略上的基本病灶。是他们没有看到诸如《茶花女》之类的写情小说所蕴含的反封建的政治意义吗？问题也许并不如此简单。改良主义者希望改变的仅仅是制度层面的东西，“中体西用”仍然是他们最理想的模式。他们不但愿从深层结构去检讨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内心深处拼命维护的正是这个东西。这就难怪“五四”时期，当中西文化论战深

入心理层面的时候，在前一阶段曾经是得风气之先的维新派人士，便纷纷落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坚决反对者。因此我们不能说改良主义者没有看出写情小说同样具有一定的政治内涵。恰恰相反，他们非常准确地嗅到了它的“火药味”，并意识到这种“政治性”与他们的主张是相违背的。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1901年，英国哈葛德所著爱情小说《迦因小传》的节译本由蟠溪子（杨紫麟）、天笑生（包公毅）合译出版。译者有意删去了迦因恋爱怀孕的下半部。1905年，林纾将其全书译出，出版后便引起一场节译本与全译本孰优孰劣之争。金松岑在《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一文中，将青年男女伦理道德之败坏，完全归咎于《茶花女遗事》等写情小说和《迦因小说》全译本的刊行。金文通过评述这一时期翻译文学在我国产生的社会效应，明确主张“崇拜”政治小说而“惧”写情小说，提出译家必须把“旖旎妖艳之文章，摧陷廓清，以新吾国民之脑界”。两年后，寅半生还撰文指责林译本：“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⑤。维新派的评论家为何对林译本群起而攻之？原因就在于它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准。而节译本是“发乎情止于礼”，既肯定为封建道德所否定之“情”，又不至从根本上违背旧道德标准，这正符合改良主义的政治要求，故倍受推崇。

清末西方政治小说的译介，直接诱导了“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这也许可以说是那场为期短暂的译介活动对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唯一有价值的贡献。梁启超等人视政治小说为最上乘文学的全新价值标准一旦流行开来，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传统小说观念的崩溃，一种新的小说观念，从此开始建立起来。靠着政治小说的作用和影响，整个小说家族在文学殿堂中的地位顿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被鄙视和冷落在屋角的“弃儿”，破天荒成为殿堂中无可争辩的“主人”，坐上了第一把交椅。这不能不说是近代文学观念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变化。因此，由翻译西洋文学而引发

的“小说界革命”，虽然只是维新派在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出现的附带产品，并非完全自觉的文学革新运动，但却成了他们对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重大贡献，这或许也是梁启超们始未料及的。

三

1908 年左右，翻译文学界日益显露出一种新的变化，政治小说译介虽说没有完全停止，但数量已大为减少。人们的兴趣已转到西方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方面，故使后两类小说的编译逐渐取代前者，成为翻译文学界的主流。

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在我国起步较早。1899 年，时务报馆翻译出版《包探案》，此后，侦探小说的译介便与日俱增。不出几年，吴趼人便惊呼：“近日所译侦探案，不知凡几，充塞坊间，而犹有不足以应购求者之虑。”^⑥1908 年，徐念慈不无忧虑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而默观年来，更有痛心者，则小说销数之类别是也。他肆我不知，即《小说林》之书计之，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记言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是观于此，不得不为社会之前途危矣。”^⑦徐念慈虽没有将翻译和创作分开，但此种情况如专针对译界而言，倒是十分恰切的。记得阿英曾经说过，清末的翻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有一千部翻译小说，那么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以上^⑧。当时最流行的西方侦探小说是《福尔摩斯探案》，该书有多种译本，最完备的是 1916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共 12 册，收长短篇小说 44 个，分别由严独鹤、程小青、陈小蝶、刘半依、周瘦鹃等 10 人翻译，刘半依作序。其他较流行的侦探小说还有：《亚森罗苹案全集》、《桑狄克侦探案》、《聂格卡脱侦

探案》、《恐怖窟》、《红发案》等等。

同期流行的西方言情小说则有《巴黎茶花女遗事》、《迦因小传》、《洪罕女郎传》、《赛雪儿》、《空谷兰》、《梅花落》等。

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的盛行，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时期，维新派所掀起的启蒙主义思潮已成强弩之末，而清政府因感到政治危机的严重，故日益加强对文化的控制。比如对1908年以后兴起的新剧运动，便严加管制。剧团在各地演剧常遭禁止，演员被捕时有所闻，有的甚至惨遭杀害。这种高压文化政策，迫使许多剧团为求生存，只好放弃政治色彩较浓的社会问题剧，改演反映社会逸闻或家庭琐事的庸俗剧目。辛亥革命的爆发，虽然使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寿终正寝，但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十分软弱，又不注意去发动群众，所以革命只能以失败告终。清帝国的覆灭使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全面解体，社会更加动荡不宁，袁世凯乘机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袁即位后，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专制政策，“不许腐败官僚以外之人谈政”^⑨。不久，复古潮流兴起，加之军阀割据，战乱不已，中国社会遂进入了一个空前黑暗的时期。早年由维新派人士绘制的理想蓝图到头来却变成一幅群魔乱舞、生灵涂炭的讽刺画，改良主义者所尽情赞美的共和政体并未使中国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于是，人们失望了，消沉了，不再相信改良派梦幻般的呓语，启蒙思想大幅度贬值。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思想禁锢，以致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愿也不敢发表什么意见，国民的政治热情急剧低落。就连过去思想激进的维新派也纷纷丢掉自己手中的改革旗帜，转向纯学术领域，甚至退回到维护传统文化的阵营中去，为复古思潮的兴起推波助澜。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国知识界，梁启超在1916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有过精当的评述：“盖四年以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什人而七八，此无庸讳者也”^⑩。